高启云与抗战期间的《泰山时报》

□李文汇

1942年4月,由于日寇对泰山地区的拉网式扫荡,莱芜县北部茶叶区地处莱芜、章丘、淄博三地交界处,群山环绕,山林密布,故泰山地委与军分区机关进驻茶叶区办公,在此可进可退,便于机动。自此,时任泰山地委委员宣传部长的高启云同志(1914-1988),在茶叶区度过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。除搞好党的抗日工作宣传,发动群众参加抗战外,最主要的任务是负责指导其参与创刊的《泰山时报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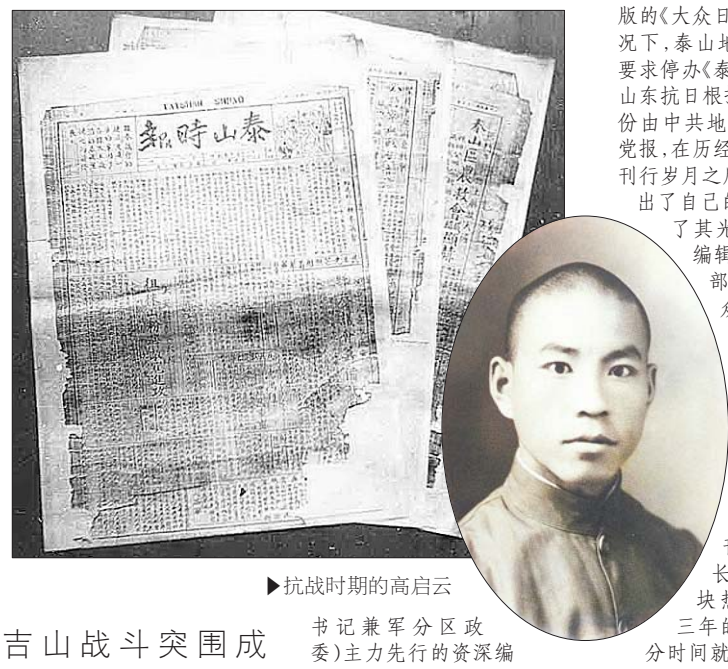
于抗日烽火中主办《泰山时报》

《泰山时报》为三日刊,四开四版的石印小报,每版可容纳3000字左右。一版主要刊登国内要闻和社论;二版刊载本地区新闻,特别是抗日斗争要闻;三版是国际新闻及世界动态;四版为文艺专论等。当时报头上印有"定价每月三角"的价格,但实际上全部免费。第一期报纸印发1000余份,通过战时邮局逐级分送到本地区各县委机关、区、乡、村的党组织以及抗日武装和团体。

《泰山时报》报社分为编辑部、经理部、印刷部。编辑部负责稿件的采写。经理部负责经费的筹措、采购出版用的机械和纸张、油墨,接送稿件,还承担着战时邮局的工作。在当时险恶的环境下,经理部的工作难度最大。为此,战时邮局配有7匹战马,确保两日内将出版的报纸送往所辖七县各处;印刷部负责排版、印刷以及印刷厂的安全保卫工作。三个部门各设一名主任,报社社长则由地委委员、宣传部长高启云同志兼任,由此可见当时的工作难度和危险性是相当大的。

中共山东省委的机关报《大众日报》创刊于1939年1月1日。但是由于抗日根据地处在日寇据点和伪顽军队的分割包围之中,省委与各地区之间的交通十分不便,尤其是泰莱地区很难看到《大众日报》。因此《泰山时报》于1939年10月10日应时应运而生。《泰山时报》编辑部配有无线电收报机,可接收到延安新华社的电讯,可以把国内外大事、党中央的号召和指示传送给各抗日的县、区、乡、村。

由于泰山地委机关地处泰山山脉,有时为躲避日寇的扫荡,常在山阴之处办公,故收报机常常因信号不好而不能全文抄录新华社电讯。遇此,高部长就凭着平日积累的对中央文件精神的准确理解,不失电讯大意地亲自抄录。高部长抗战前在济南乡师读书时就才华横溢,常给《中国农村》、上海的《文化报》等进步报刊写评论文章和散文等。



▶抗战时期的高启云

吉山战斗突围成功,保留报纸火种

在1942年10月17日的吉山战斗中,当非战斗人员在高部长的带领下,离开刘白杨村到达高白杨村东时,吉山方向传来密集的枪声,听阵势敌人是有备合围而来。报社编辑部和地委电台部的同志都是非战斗人员,为了保护电台和编辑部机关,高部长缜密分析敌情后,当机立断,毅然决定改变原行军路线,从凤凰山下的曼里村穿插至法山峪,爬上吉山北面的潘家崖村。这时,枪声逐渐停了下来。同志们都急着下山去看看,但高部长认为下山去无济于事,还是保护电台和编辑部要紧。在不停地转移中,他们来到了坐落在悬崖边上的逯家岭村,又登上了卧铺村东面的摩云岭。站在摩云岭上,已经看到博山城的电灯亮了。高部长说:"不知道上王庄的印刷厂怎么样了,我们到那里看看情况吧。"于是,一行十几人摸黑下山来到上王庄,幸好印刷厂完好无损。在吉山战斗中,编辑部遭受惨重损失。跟随汪洋政委(时任泰山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)主力先行的资深编辑李爱文、李新华、腾振戈、郝克昌及年仅17岁的誊写员孟华全部壮烈牺牲。跟随高启云部长突围的编辑部主任官达非、编辑董彩、记者方正、誊写员查仲谦幸免于难。就是这几个人日后成为《泰山时报》的核心骨干成员,担负起泰山区党报宣传的重任,继续编辑出报,直至终刊。由于高启云部长的多谋善断,英明果敢,才保留下《泰山时报》的火种,保留了泰山区党报宣传的基本力量。

吉山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上午,高部长组织茶叶区的党政干部与群众,将烈士们的遗体掩埋。每座坟墓前大都竖起一块木牌,上书烈士的姓名。高部长抚摸着木牌心如刀割,痛哭失声。

1944年7月,《泰山时报》完成使命停刊

1944年,山东根据地的抗战形势逐渐好转,敌人对根据地的封锁愈显乏力。省委与各地区的交通开始顺畅起来。在泰莱地区可以看到三日前出版的《大众日报》了。在这种情况下,泰山地委报上级批准,要求停办《泰山时报》。这份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内,唯一的一份由中共地区级组织创办的党报,在历经五年艰苦卓绝的刊行岁月之后,于1944年7月印出了自己的《终结号》,完成了其光荣的历史使命。编辑部和印刷部的大部分人员编入《大众日报》社,部分进入地委宣传部。经理部人员大都具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,他们继续为民族解放事业做着重要的工作。

《泰山时报》刊行五年间,高部长在莱北茶叶区这块热土上度过了近三年的时光,其中大部分时间就活动于茶叶区的青山绿水之间。吉山战斗后,高部长指示报社编辑部改变原来跟随地委行动的路子,采取机动灵活的方式,穿行于茶叶镇的村村寨寨与地委所在地之间,下法山村、中法山村、上法山村、卧铺村、逯家岭村、上王庄村都曾是报社编辑部的常驻之地。重要的是在这里我党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,茶叶区人民自觉而有组织地站岗、放哨、传递消息,提供食宿,甚至不惜牺牲生命。茶叶区人民为抗战、为《泰山时报》的顺利刊行与高部长一样做出了重大贡献。

当时,泰山区的抗日宣传工作就受到了上级的表扬,时任山东分局宣传部长、省战时工作推进委员会秘书长的李竹如同志,在省宣传联席会议上指出:"应该表扬的是泰山区的工作,对党员的教育比较普遍细致。《泰山时报》进步迅速,材料充实,编辑活泼,印刷亦颇精美,为地方报纸中最好的一份。"

(本文作者系中共莱芜市莱城区茶业口镇党委书记)

宋江为什么最后选择招安

□刘传录

上大学时看《水浒传》,常常有一种激愤,梁山为什么不再跟朝廷斗下去,并且特别讨厌宋江,对他接受招安有几分无奈与不满。宋江为什么要接受"招安"呢,招安就意味着投降啊!当时没有细致地思考,只是觉得像李逵说的那样杀到东京夺了鸟位才心里敞亮。

宋江一心招安,在多数人看来不可理喻。其实这是不了解宋江的苦处,他是一个受儒家影响比较大的文人,从骨子里是忠君的,他也有野心,想成为一方大员,他把梁山军队作为他实现野心的砝码。但是军队是需要吃饭的,粮食是第一位的,但是梁山在发展的过程中,忽视了粮食的生产,最后为了活命只能选择招安。

梁山处于梁山泊中,没有耕地。王伦时期以抢劫为生,是典型的土匪时期。晁盖、宋江都是奉行的流寇主义,没有像田虎、方腊建立根据地或游击区,不从事粮食、渔牧等生产劳动。梁山集团唯一的收入就是抢劫,应付一段时间后,就去打伏抢劫,为喽啰们提供衣食保障。

王伦时期,梁山不足700人,山寨最重要的经济指标就是月耗粮食量,每人的花销折算成粮食计算,平均每人每天最低耗粮一斤,月耗食量为700×1×30=21000斤。当时梁山泊摊子不大、人员不多,吃饭没有问题,还有了一定的资金积累,搞了基础设施建设,建起了山寨,修筑了聚义厅和耳房。

晁盖上山带来了10万生辰纲,梁山的人数没有大的变化,经济状况有了根本好转,晁盖又做了三件大事:修理山寨、打造军器、安排船只教水手上船厮杀。晁盖只取金帛财物,不伤害客商性命,将打劫所得的财物平均分为公私两部分:一半用于山寨的公共事务,赏赐有功喽啰,花钱贿赂官府官吏、接山寨大头领的家小上山居住生活。而余下的一半财物,又平均分成两半,1/4由十一位有交椅的大头领均分;另外的1/4则由其余的七八百号喽啰平均分配。此时是梁山和谐发展的黄金时期,持续了2年左右。即使是花荣、秦明等好汉上山后,梁山吃饭也没有出现问题。

江州劫法场,宋江上梁山后坐了第二把交椅,梁山的人数激增,领导不得不为手下吃饭奔波,本来晁盖不赞成攻打祝家庄,宋江以"即日山寨人马数多,钱粮缺少"为理由,晁盖就不好说什么,可见梁山严重缺粮。从宋江的言语中能推测出梁山攻打祝家庄时的大体人数,宋江推测若打得此庄,倒有三五年粮食。打下祝家庄以后,梁山将士把"祝家庄多余粮米,尽数装载上车;金银财赋,犒赏三军众将;其余牛羊骡马等物,将去山中支用。打破祝家庄,得粮五十万石"。在宋朝,1石约有76公斤,那么,打破祝家庄梁山得粮有7600万斤!以梁山人马吃三年计算,假设每人每天吃1斤,梁山人马将近8000人。当时梁山出动6600人马攻打祝家庄,占军队总数的80%以上。

宋江入主梁山第一把交椅后,盲目扩大规模,二龙山、少华山、桃花山、白虎山、芒砀山,有的三五百人,有的七八百人,芒砀山则有三千之众。特别是呼延灼、关胜的入伙,让梁山补足了军械,军队的战斗力有了提高,梁山攻打曾头市出动军队近2万人。但随着投降军的大量增加,梁山人马达到3万人以上,却陷入了没有隔夜粮的困境,梁山集团只好下山借粮,先后攻打了高唐州、青州、东平府、东昌府和北京大名府,每次破城,梁山都打开仓廒,将粮米装载上车,运往梁山泊贮用。

宋江、卢俊义清楚地知道,梁山的实力无法夺取大宋江山,长期作山贼草寇又没有经济基础,无法养活大批人马,梁山的现实出路只有两条,一是没有吃喝自行解体,二是接受朝廷招安。解体不符合宋江实现野心的需要,那只有一条路可走——招安,宋江竖起"替天行道"的大旗,亲自去东京寻求招安路子,终于得到了朝廷的回应,最后众人随宋江接受招安,归属朝廷,当下辞去的也有三五千人,可见招安符合梁山的大局利益,实现了梁山好汉招安做官的人生价值。但由于宋江想凭借梁山军队和朝廷谋取更大利益,不按照朝廷分散安置的办法办理,以回梁山为要挟,妄图保持梁山的原建制,受到了朝廷的猜疑,受到不公正的待遇,最后以悲剧的色彩落下了梁山事业的帷幕。

【齐鲁英雄谱】

打架飞机做碗用

□李炳来

也许很多人还都记得,前几年市场上曾一度流行"无烟锅",说它是采用含磁化分子的航天特种陶瓷合金一次精铸成型技术,从根本上杜绝了油烟的产生。但最后事实证明,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。虽然用航天特种陶瓷合金做锅的没有,但用飞机做碗的事,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曾发生过。

快30年前,我刚从军校毕业,去一位朋友家里。他用一个玻璃杯给我倒了水,自己用的却是一个铝碗。见我有些不解,他说这碗是他家的宝贝,现在花再多的钱也买不到,是用日本飞机材料做的。

当时我还以为他是同我开玩笑,直到后来他结婚时我见到他父亲,才知道这事是真的。打架飞机做碗用,也只有我们八路军有这样的气魄。

1943年,刚由八路军山东纵队五支队三团二营精简为东海独立团的二营,在结束了1942年冬季反拉网扫荡后,又奉命在荣成打游击,经常活动在崖头一带。盘踞在荣成的日军几近困守孤岛,企图挽回处处挨打的败局,就请求飞机对我抗日根据地狂轰滥炸。

4月22日这天,两架日本飞机欺负我们武器不行,在崖头进行超低空轰炸,甚是猖狂。东海独立团二营五连指战员忍无可忍,就用机枪、步枪予以还击。一架敌机还真被我军打落一块铁片,并当即仓惶而逃。估计敌人不会善罢甘休,极有可能再来报复,于是连里就召开了"诸葛亮会",总结这次对空作战的经验教训,研究应对措施,讨论怎么个打法,才能更好、更狠地打击敌人。最后决定,组织几个射击组,据点防守,并将机枪绑在崖头村北庙里的大银杏树的主枝上,既便于掩蔽,出敌不意,又能增加机枪的射高。

果然不出所料,第二天上午,一架敌机从东南方向直扑过来,并在崖头村上空进行轰炸。当敌机低空俯冲轰炸时,我各射击组同时瞄准射击,敌机中弹爆炸,敌机当场就摔了下来,三名机组人员也全部上了西天。

这次对空作战,我军缴获机枪筒和转盘各一个,探照灯一个,测量镜一副,大型炸弹、毒瓦斯弹各两枚,以及电报密本、日记等文件一宗。同时,从缴获的文件和破碎的机身上查出,被击落的这架轰炸机是敌第三潜质支舰队青岛空军部队337号。

听到八路军击落日本飞机的消息,当地群众无不欢欣鼓舞,奔走相告,崖头附近几个村庄的乡亲,冒着敌人随时都有可能再派飞机进行报复的风险,都过来看热闹。

由于那时各种金属都十分稀缺,兵工厂的同志就废物再用,将机体残骸化铸成了七百多个铝碗,发给了东海独立团的战士,大家都当成了稀罕物,这才有了打架飞机做碗用的说法。

据有关史料记载,在8年抗战中,八路军在一没有空军,二没有高射炮、高射机枪等对空作战武器的情况下,共击落敌机51架。1943年在崖头击落的这架敌机,是我抗日军民当年击落的8架敌机之一,也是在胶东地区被击落的第一架日本飞机。